

在“转向”中运动

——20世纪科学哲学的演变及其走向

郭贵春 (山西大学 山西太原 030006)

殷杰 (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博士生 山西太原 030006)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862(2000)08-0029-04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正越来越突出地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方面,科学的物质功能和应用价值直接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对世界的改造,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视界,有力地促进了人类从权力社会和财力社会逐渐地向智力社会的过渡;另一方面,科学自身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蕴在更为深远的层次上影响并决定了人类思维的发展和演进。这后一方面,对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是更为根本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因此,作为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的科学哲学,它对于科学从哲学的乃至思想史和理论社会学的视角所进行的整体的、全方位的透视和探究便越益显示出其时代意义和存在价值。

但是,从总体上讲,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呈现了一幅波澜起伏、犬牙交错的历史图景。如何从浩繁的著作、众多的流派、陈杂的观点和激烈的论争中透视出科学哲学的发展路径,便成为摆在科学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我们把科学哲学20世纪的发展归结为在“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中的运动,正是试图以“三大转向”为基点和中枢,通过系统地分析其形成动因、理论特征和方法论意义,来具体地展示科学哲学思潮演化的历史进程、趋势定向和理性重建的模型及其各种特征,从而为把握科学哲学21世纪发展的方向和构建科学哲学新的生长点提供合理的范式基础和可用的方法论手段。

一、科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作为哲学思维的一次根本性变革,使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研究的中心课题,它对传统哲学理性产生了强烈震撼并对后世哲学发生了决定性影响。

从总体上讲,语言转向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现代逻辑的产生。现代逻辑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具有了一种在哲学研究中对语言进行分析进而解决传统问题的科学的系统的方法。同时,这场革命性的运动,也是由哲学思维的内在发展和时代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的出现,自然科学越来越远离经验发展。科学理论的构造、解释和评价问题便在科学哲学研究中愈来愈具有了突出的地位。因为哲学本质问题的争论,归根结底存在一个语言的表述和解释问题。在逻辑的自治性与语言的规范性的一致性要求下,社会语言学向逻辑语言学的发展,要求寻找它的应用层面。这样逻辑和语言与经验的统一性问题,即科学理性与经验的一致性问题,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因此,把所讨论的对象的本体论地位悬置起来,用统一的语言语词表达和重新解释,避免无益的争论,无疑是一种有利的、必要的策略。

“语言学转向”是一场在新的基点上探索哲学存在新方式的革命。其最直接的后果在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兴起，即把观察陈述视为构成整个科学理论的理性重建的逻辑起点，并试图在科学语言的逻辑统一的前提下，对科学理论进行经验主义的理性重建。为此它引入了新的语言分析，特别是语义分析的方法，开拓了哲学研究的新手段，并进而在后现代的意义下消解了传统的对应论的本质论、符合论的真理论以及反映论的认识论。

但是，语言分析不是万能的。试图通过建构理想语言来解决所有哲学问题，既不是自明的，也不是必然的，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实践，是人类的公共交往形式，只有把语言理解与解释经验、语言分析与语言使用相互渗透和融合，才能真正地发挥语言在哲学认识中的功用。同时，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得非理性因素受到不应有的忽视，并对文化进行了消解，加剧了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现代分裂，引致了科学主义与人文科学之间绝对的、僵化的界限形成和逐渐远离的局面。

无论如何，“语言学转向”带给20世纪科学哲学研究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启迪性的和创造性的。尽管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必然地走向了衰落，但它的研究策略、方法、理论，仍长期地影响着科学哲学的发展。事实上，在它之后所产生的各种科学哲学流派，包括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实在论和逻辑实用主义，都是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对其正反不同的方面借鉴、批判而形成的。“语言学转向”的策略和逻辑经验主义的方法深深地渗入了各种流派理论研究的方方面面之中。

二、科学哲学的“解释学转向”

“解释学转向”(Interpretive Turn)始于由库恩、海西和费耶阿本德等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家们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特别是反对根据科学主义的教条去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绝对划界的“实践运动”。它是解释与理解在方法论上的融合，即分析与解读的统一。这种语言理解与解释经验、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作为它形成的普遍化方式和整体途径，不仅突出了解释学转向与语言学转向之间的密切关联，而且是对后者的修正和超越，从实质上赋予了解释学以更强烈的解释实践的特征，从而满足了解释背景必须是科学、社会、文化与历史相统一的趋向，反映了心理意向解释重建的内在要求。

“解释学转向”所予以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在于历史主义的整体进步。从本质上讲，科学理论的解释与解释学的文本理解从来就不是绝对地排斥的，而是在社会与文化的整体纽带中密切相联的。另一方面，“解释学转向”在更为广阔的时间序列和社会空间上影响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促进了科学实在论的全面复兴。

总之，“解释学转向”及所引发的解释学方法在整个认识论领域的全面扩张和渗透，使解释学方法脱离了狭隘的思辨域面进入了一个广阔的与社会历史相关的新视界，强化了解释学方法的整体性、相关性和一致性。这一发展，既促进了解释学在方法论上的多样性、本体性上的多元性和认识论上的深入性，同时也推进了整个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之间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可能趋势；而解释学方法在科学哲学尤其是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表明，解释学方法的真正价值就在于通过实践理性的环节，通过自身方法论功能的充分展开，去创造实现社会理性的条件。可见，在具体的解释学方法的功能意义上，去达到和实现人类认识的必要条件，才能真正地推动社会理性的进步。

三、科学哲学的“修辞学转向”

“修辞学转向”(Rhetorical Turn)是一种在现代语言学、现代心理学和现代逻辑学的基础上,将古代传统的“劝说艺术”重建为一种全新的论证艺术的运动。它是继“语言学转向”和“解释学转向”之后,人类哲学理智运动的第三次转向,并构成了社会科学与科学哲学重新建构探索的“最新运动”。从20世纪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演变历程来看,逻辑经验主义侧重于符号化系统的形式语境,历史主义强调整体解释的社会语境,具有后现代趋向的后历史主义则侧重了修辞学语境。而修辞学语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语用分析的情境化、具体化和现实化,是以特定的语形语境的背景和社会语境的背景为基础的,它必然是语形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方法的统一,是形式语境、社会语境与修辞语境的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修辞学通过在科学解释学的实践重建而扩张了科学哲学的研究,奠定了后现代性的方法趋向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扩张和发展的可能性的基础,成为后现代科学哲学之后现代性的集中体现。

“修辞学转向”决非偶然,而是科学哲学发展的内在需求和修辞学自身的理论发展所推动的。一方面,“语言学转向”对形式化的逻辑分类和理性分析的过分强调,阻碍了人们对特定科学语境中大量合理的和可接受的论证的分析和研究,以至于单纯的形式理性的逻辑方法成为“科学研究的贫乏工具”;同时,“解释学转向”通过对逻辑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把人类的行为、科学、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文本来阅读,强调作为对话的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协调和互补,把科学的构建、陈述和证明看作是“修辞学的转义”,从而强化了理论表述的实践的、历史的和整体的统一。这些都埋下了“修辞学转向”的种子;另一方面,“修辞学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使各个学科可被概观的视界。作为一门学科,它具有解释学的任务并生成知识;作为一种视界,它具有批判的和解放的任务并生成新的观点。”正是由于它的这一特点,使人们意识到在修辞学与科学理性之间人为设置的绝对界限是极其狭隘和站不住脚的,而修辞学作为科学交流的工具和消除交流障碍的手段,应被毫不犹豫地引入科学的研究中。这样,修辞学便强烈地渗入科学哲学的研究中。

随着“修辞学转向”作为一种运动的进一步开展,L. 普莱利、A. 格罗斯、H. 西门斯、D. 夏佩尔、M. 佩拉和W. 舍等哲学家将之引入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为“科学修辞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给出了可选择的趋向,从而酿就了科学哲学领域的“科学修辞学转向”。从本质上讲,科学修辞学是运用说明论证的艺术,以改变或强化在科学交流中具有认识价值的观念。这种说服或修辞学的论证既不是形式上严格的,也不是经验上强制的。科学的修辞学是科学家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结论而使用的那些说服、论证技术的集合,而不是表征模型。因此,“科学修辞学”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向,是修辞学的特征在科学方法论中的新的实现,是与科学理性和科学认识论相容的和一致的。其目的就是要把科学修辞学作为一种确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科学论述的修辞学特征,从而在科学论述的境遇、选择、分析、操作、发明和演讲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向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

四、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走向

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地席卷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它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具有着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征主义的实质。因此,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的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震撼。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学领域中泛起漪澜。而“三大转向”尤

其是“修辞学转向”所引致的解释实践重建和科学修辞学方法又为科学哲学的后现代性选择提供了可能性的基础。当“后现代性”渗入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时，后现代科学哲学便孕育而生。

后现代科学哲学趋向是在各种各样丰富的科学哲学理论的具体演变过程中形成和展现出来的。这种方法论视角的转变和研究背景的改变，是以不破坏科学哲学的总体目标、趋向和本质为条件，以拓展科学哲学研究的空间、手段和深度为要求，以强化科学哲学自身所特有的学科性、表述性和语词性为特点的。它们不是以囿囿的东西对应地搁置于科学哲学的框架之内，而是作为一种活的人类理智的要素被有机地消化、吸收和深入了科学哲学独特的有机体之中。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在理论上不断地由单一走向多元，由绝对转向相对，由对应论转向整体论；在实践上，由逻辑转向社会，由概念转向叙述，由语形转向语用；在方法上，由形式分析转向了对语义分析、解释分析、修辞分析、社会分析、案例分析及心理意向分析等的具体引入。总之，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具有着对象的、层面的、视角的和意义的不同，反映了后现代科学哲学所具有的多样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总之，在把握科学哲学未来发展的走向中，我们提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概念，是为了把科学哲学的发展放到整个后现代科学、文化和社会的大背景中去思考，从而把握其时代走向的本质特征。应当看到，后现代科学哲学意指的是科学哲学发展中的后现代趋向，而不是任何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所以，“后现代性”哲学仅仅是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战略”，一种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方法的转换、趋向的调整及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教条或模型。

以“三大转向”为基点框视 20 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一方面为总结科学哲学在本世纪的演变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和“经济的”思路；另一方面，更为把握科学哲学未来发展的走向提供了合理的途径。这就是，“三大转向”所孕育而生的“语境”（Context）成为未来哲学的生长点。“语境论”的科学实践观作为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消解绝对偶像和对应，排除惟科学主义等的必然产物，在科学实践中结构性地引入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要素，吸引了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的各自优点，借鉴了解释学和修辞学的方法论特征，从而超越了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科学哲学的趋向选择，显示了强烈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的走向。因此，它是一个有前途的、可以融合各种趋向而集大成的趋向。

参考文献

- [1] 郭贵春. 当代科学实在论. 科学出版社, 1991.
- [2] 郭贵春. 后现代科学实在论. 知识出版社, 1995.
- [3] 郭贵春. 后现代科学哲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4] D. R. Hiley, J. F. Bohman, R. Shusterman. *The Interpretive Tur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 [5] E. D. Hirsch. *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 [6] H. W. Simons. *The Rhetoric Tur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7] A. G. Gross. *The Rhetoric of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8] Z. Parusnikova. *Is a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Possibl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 1992.
- [9] S. Seidman, G. David Wagner.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Theory*. Basil Blackwell, 1992.
- [10] N. Murphy. *Scientific Realism and Postmodern Philosophy*.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90.

(责任编辑 徐 兰)